

LI HUNG CHANG

国外经典李鸿章传记版本 晚清“再造玄黄”的智慧一生

[英] 布兰德 (Bland, J. O. P.) / 著 王纪卿 / 译



李鸿章传

亲自采访过李鸿章的知名西方学者

占有大量一手资料，立论客观

多视角认识晚清第一名臣李鸿章

舍小得大的政治智慧，内外逢源的驭人之道

CT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LI HUNG CHANG

李鴻章傳

【英】布三德 (Bland, J. O. P.) / 著 王紀卿 / 译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CS-BOOKY

博集天卷
CS-BOOK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鸿章传 / (英) 布兰德 (Bland, J.O.P) 著; 王纪卿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404-5130-1

I. ①李… II. ①布… ②王… III. ①李鸿章 (1823 ~ 1901) —传记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91670 号

上架建议: 社科文史·人物传记

李鸿章传

作 者: (英) 布兰德

译 者: 王纪卿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丁丽丹 刘诗哲

监 制: 伍 志

特约编辑: 康 慨 徐 海

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

版式设计: 利 锐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5130-1

定 价: 29.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译者的话

在我着手翻译这本《李鸿章传》之后不久，互联网书店开始热销一本名叫《李鸿章回忆录》的译文书。那是一部已被判定为赝品的伪书，其炮制者是一位名叫曼尼克斯（Mannix）的美国人，他在1900年曾随美国第9步兵团到过华北。他回到美国后因罪入狱，在监狱服刑时借阅了大量有关晚清中国与李鸿章的资料，阅读之余，自己进入李鸿章的角色，杜撰出了这么一本回忆录。他伪造的回忆录出笼后，曾在欧美风行一时；而到了今年，该书的中译本又在中国热销起来。这种情况表明了两个事实：其一，外国人对我国清末的大人物李鸿章怀有极为浓厚的兴趣，对其传记的产销和阅读投入了极大的热情，甚至不惜造假；其二，中国的读者也很希望了解外国人对于李鸿章其人的看法，哪怕是从一本假造的回忆录中去了解他们对这个中国人的塑造。

有关外国人对李鸿章的关注与评价，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本书下一页刊载的那幅题为“当今天下三大佬”的照片，拍摄的是19世纪欧洲雕塑家F. R. 卡登堡（Kaldenberg）为当时世界上的三大伟人所做的塑像，左、中、右三人依次为俾斯麦、李鸿章与格兰斯顿，可见李鸿章在这位雕塑家眼中是何等的伟大。

至于读者手中的这部《李鸿章传》（*Li Hung-chang*），则是值得信赖并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知名度的李鸿章传记。其作者布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1863—1945）是李鸿章同时代的英国作家和记者，



◇当今天下三大佬

在晚清活跃于中国的各种舞台，是一个地道的中国通。他在 1883 年就到了中国，那正是李鸿章一生中的全盛时期。

布兰德在抵达中国以后的 12 年多时间内，都在中国海关工作，供职于汉口、广州和北京。1889 年，26 岁的布兰德在上海娶了一位名叫路易莎的女子为妻。1896 年，他脱离海关，出任上海市议会的助理书记官，第二年继任书记官一职。这个议会是控制上海国际殖民地的机关，布兰德时为上海滩的权要，对这座大都市以及中国的政情十分熟悉。他同时还开始从事独立记者的第二职业，调查并报道中国的各种状况。他于 1906 年离开市议会，在英中公司（BCC）得到了一个新的职位，成为该公司以北京为基地与中国政府谈判铁路贷款的代理人，直到 1910 年被该银行解雇。布兰德于是回到英国，而这时候，晚清名臣李鸿章辞世已有 9 年。

布兰德与中国并未缘尽于此。1920 年，他以作家的身份再次来



到中国，主要写作中国的题材，有一系列时评书籍出版，主要有《在华的最近事件与当前政策》、《中国、日本与高丽》，以及他与埃德蒙·拜克豪斯爵士（Sir Edmund Backhouse）合作的两部记述中国历史的畅销书《皇太后治下的中国》与《北京宫廷年鉴及回忆录》。

布兰德一直关注着本书的传主李鸿章。他在居留中国期间，曾于1900年作为《泰晤士报》的记者在上海拜访李鸿章，与他讨论义和团危机及其后果。那是在李鸿章去世的前一年，这位老人已在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作为失败者而失去了昔日的风光，并已在周游欧美列国后返回祖国，时任两广总督。布兰德后来回忆了当时所见到的李鸿章：“年迈的李总督那时身体正在迅速衰弱。他走路要靠仆人搀扶，显得非常脆弱。但此人不屈不挠的精神绝未熄灭，其头脑没有衰竭的迹象，当他感到愤怒时，眼光熠熠闪亮，一如既往。”

布兰德与李鸿章的那次会面，也许正是他为李鸿章写传的契机。读者手上的这部《李鸿章传》英文原版于1917年问世，当时布兰德已是一名独立作家与评论家。这是布兰德54岁时完成的成熟作品，完整表达了他对李鸿章与晚清中国的独特见解，展现了他以流畅和雄辩而见长的文风。作者以新颖的结构与丰富的记述，根据李鸿章作为中国官员、作为外交家、作为新式军队和国防建设者的不同身份，多方位、多视角地解析了这位中国晚清巨擘的一生。

此书收入了英国“19世纪打造者丛书”，这个事实本身就意味着本书作者和该丛书的编者已将李鸿章的历史定位摆在最高的层面，把极大的荣誉给予了这个在国内备受诟病的中国人。这些英国学者究竟有什么样的理由如此抬举李鸿章，是值得中国的读者去开卷一读的。

在这部评传中，布兰德反复声称，李鸿章之所以能够走在同时代国人的前列，之所以有资格入围 19 世纪的打造者，是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了清末的中国缺乏实力，无法与列强直接抗争，而只能牺牲一些利益来换取和平的环境，以便从事现代化的建设，以增强经济和国防力量，而他的这种努力，使他在海外享有盛名，并部分地取得了成功。布兰德的这个观点是否站得住脚，是否能够为当代中国人所接纳，尚须接受读者诸君的检验。

另一方面，布兰德又一再强调，李鸿章之所以未能把中国引向富强之路，他那耗资巨大、苦心经营的海陆军之所以在 1894 年的中日战争中遭到惨败，完全是因为他任人唯亲、贪污腐化所致。这个看法，跟中国人 100 多年来对李鸿章的评价毫无二致。贪财是李鸿章及其僚属的致命伤，而官场腐败是导致中国贫穷落后、社会动乱的罪恶之源。布兰德认为李鸿章及整个封建官僚体制留下的这份邪恶遗产，后来又被中华民国的官僚集团所吸收，以至于流毒无穷，给人以革命未能彻底的印象，确实是颇有见地的。在 21 世纪的今天，官员腐败对中国社会的严重威胁犹在，乃是全国民众同声檄讨、深恶痛绝的罪恶渊薮，李鸿章给后人留下的历史教训，实在是值得重温，值得从布兰德的这部著作中寻找批判性的借鉴。

清末由湘、淮军出身的三位军政重臣，即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左宗棠与李鸿章都曾受到曾国藩的提携，而李鸿章更是曾国藩的“肘下之人”。但是，曾国藩和左宗棠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位大清官，而李鸿章却未能承继曾国藩清廉自守的衣钵，为他自己也为中国的历史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本书中引用的李鸿章的奏稿和书信，均依据清人吴汝纶编辑的

《李文忠公全集》、宝鋈等纂修的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王先谦所纂的《东华录》和朱寿朋所编的《光绪朝东华录》所载文本的对应部分直接录入。必须说明的是，书中摘自伪书《李鸿章回忆录》的部分，译者尽量仿学清人笔法译为中文，但此中文绝非李鸿章原著，因为李鸿章本来就没有写过这些文字，而是美国人曼尼克斯捏造出来的。

此外，布兰德先生文采不俗，熟悉多种欧洲语言，在原著中使用了不少法文和意大利文的成语，使文章生色不少，但我在译文中没有标出这两个语种的语句，仅将部分此类语句用双引号括之，或以斜体字排版，特此说明。

这个译本和我翻译的《左宗棠传》与《曾国藩传》相继由中南博集天卷公司推出，是这三种外国人研究晚清超重量级人物的传记名著第一次以中译本的形式出版，显然具有史海钩沉、发掘整理以及在学术上突破禁锢的意义；而且，由于三个译本业已形成系列，给读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个出版行为又是崭新的开拓之举。为此，我要再次感谢博集天卷领军人黄隽青先生的慧眼识书，以及康慨、楚静、徐海三位编辑做出的可贵努力。

王纪卿

2011年伏月谨识于长沙听雨轩

总编前言

英国下议院的大厅里有许多生动的场景，斯皮克先生每天都会由权杖引导，在其牧师与秘书陪伴下从大厅里走过，而布拉克·罗德会来进行例行的巡视，把议院的大门迎面拉过来，在将下院议员召去上议院之前，他会在门上敲打三下。但我所见过的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场景，发生在几十年前一个夏日的下午。当我走出下议院时，我忽然迎面遇见了李鸿章，他急匆匆地走进去听一场辩论。他个头极高，一脸和善的表情，作为一个来自另一世界的陌生人，穿着一身蓝色的袍子，显得光彩夺目，步态与风度颇有尊严，嘴角挂着谦和的微笑，表明他对见到的一切都很欣赏。就外表特征而言，很难想象这一代或上一代的任何人能够亲近李鸿章，并不是因为他给了你功勋卓著或大权在握的印象，而是因为他的风采中散发出一种高贵的人品，如同半神半人的自我满足和超然物外，而又老于世故，向劳苦大众屈尊降贵。

在这一方面他似乎非常具有典型性，这对他那更加神秘的国度而言，是异乎寻常的。当我们还是身染靛蓝的野蛮人时，中国人早已在享受直到如今仍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我们的文明，随着其政治的所有兴衰变迁，他们已经培育出了一种高标准的文化，一种对于其余世界的优越感，一种不为他们自身或其他国家政治利益所扰乱的人格尊严。这些特点无疑主要是源于他们的封闭。正如 1715 年陪同彼得大帝的使节去见中国皇帝的约翰·贝尔先生在其报道中所说：

中华帝国在一定程度上隔绝于世界的其他部分，其所处的位置气候宜人，有益健康，东面和南面有大洋环绕，而北面与西面有连绵不断的高崖与贫瘠的群山，那道著名的长城就蜿蜒建在那些山上，筑起另一道屏障。然而在我看来，帝国对付侵略的更大保障是那片光秃秃的沙漠，向西延伸几百英里……南面与东面的海洋确实是开放的，中国可能在那边遭到攻击；但我相信，没有一位君主会觉得有什么理由去打搅自己与如此强大的中国人民的宁静，后者愿意与所有的邻邦和平共处，而且似乎满足于他们自己的领地。

约翰·贝尔的预言在一百多年内持续有效，接着攻击到来了，就像他推测的那样，是来自南面与东面开放的海洋。李鸿章对于19世纪历史的兴趣，建立在这个事实上：他是第一位名副其实的中国政治家，应召去处理祖国古老体制所遇到的这个新危机。由于出生、教育与天性，他严守种族的传统，所以他自然会轻视外来者，但他仍然是中国人中的第一位，承认不可完全无视“洋鬼子”，承认他们已经到来，承认中国的政治将不会把他们置之度外。布兰德先生的著作说得很明白，李鸿章有许多严重的缺陷，这对于一个主要兴趣不在政治方面的种族而言是很自然的，但没有一个人能比他更娴熟地将同胞们领上他们此后无法避免的那个国际政治的舞台；的确，尽管他有那么多的缺陷，但他为中国、为他自己在世界上赢得了一席之地，远远超过了其本身的意义。一言以蔽之，李鸿章为一种直到当时为止中国未曾有过的对外政策奠定了基础。

贝西尔·威廉斯

1917年3月于切尔西

目录 · 李鸿章传



第一章	李鸿章事业起步时的中国形势	001
第二章	早期生活及家族	029
第三章	中国官员李鸿章	057
第四章	外交家李鸿章（一）： 与法、日两国的关系	093
第五章	外交家李鸿章（二）： 与俄国的关系·周游海外·1900年的和谈	137
第六章	海军与陆军管理者李鸿章	161
第七章	经世家与政治家李鸿章	187
第八章	人物方程式	207
参考书目		234
大事年表		238

第一章

李鸿章事业起步时的中国形势



李鸿章是许多变易的创始者，自从 1850 年以来，这些变化已经改造了中国人民的结构与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李鸿章无疑可以算做 19 世纪的一个打造者。不过，正如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其有关“伟人”历史观的评析中指出的那样，我们必须记住，“伟人必须归入那个诞生了他的社会中的其他现象之列，把他当做其先前发生的现象的一个产物。他是整代人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和整代人一起，都是已经合作很长时间的巨大力量集合的必然结果”。

为了公正地评价现代中国伟人第一号人物的事业生涯，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他的起步，并仔细地考察其所处环境中占主导

地位的社会与政治影响。

因此，在记述李鸿章的毕生事业及其对现代中国历史的影响之前，我们最好概要地回顾一下在其步入官场时的中国形势，并格外注重欧洲物质文明的强力冲击在此导致的结果。

李鸿章一度是镇压太平军的军事领导人，在他为这段出色的事业打下基础的时候，西方的军队和商人对中国闭关自锁的入侵，已经成为一个持久的因素，显然注定要改变中国人民的态度和习惯。新力量以如此强大的力道突然冲击一个天性反感变化的民族，必然会使适应的过程变得很困难，并且使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充满很大的危险。作为一名政治家，李鸿章天赋中最出色的特征包括，他在同时代人中几乎是孤独的，他当即便意识到了这些新力量的能量，意识到了必须通过迅速改革古老的教育与行政体制来迎合这些力量（如同日本取得了变法成功的做法）。中国政府治国之术的原则与传统，到这时为止具有的特点是：在几个世纪的闭关自守中，对于维护基于道德力量的独裁体制，以及以其单一延续性而著称的一种文明形态，其有效性得到了实践的证明。李鸿章作为大人物的首要资格，以及其充满五花八门活动的漫长事业生涯中的基调，都建立在一个事实之上：他从一开始就领悟到，西方的蒸汽驱动与军事科学，必然会飞快地将其祖国的许多古老的传统扔弃到容纳无用和过时之物的废物场。他努力引导同胞们认识这个真理，尽量减少变化莫测的环境导致的危险，但他的努力注定要失败，不仅因为中国人民从天性而言无法完成要求他们作出的迅速转化，而且因为李鸿章本人在某些重要的层面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官僚。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个人野心和贪财，他的工作中存在腐败，其效用遭到了损害，而

就连他最具进步性的追求，有时也被儒士与生俱来的偏见破坏了。由于他身边是深邃的黑暗，他的光辉显得格外明亮——他满怀勇气与爱国的热情；他身心的能量都非同寻常；他的潜力无限，不论是在灾祸还是泰福之中，他都发挥了许多令人钦佩的品质。然而，在他完成上述功绩的同时，他本质上仍然是其祖先的自然产物，塑造他的社会形态在他身上刻下了其所有的品质与缺陷。



◇李鸿章

我们且来概略地考察一下在他初登政治舞台时那种社会形态的状况。太平天国运动在 1851 年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李鸿章后来正是因为镇压这场造反运动，首次赢得慈禧皇太后的感激，并得到其同时代人高度的评价。李鸿章当时大约 28 岁，刚刚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经典课程的最终殿试，这使他能够进入翰林院，即进入卓越学者的学院。这场蹂躏帝国长达 13 年的大规模造反运动破坏了 9 个省份，使人口减损达到 1 亿多，它是整个中国历史中反复循环发生的那些动乱之一，是由中国社会体制打造的经济状况不可避免带来的结果。笔者曾在其他著作中指出：

回顾一下自从唐朝末年以来（粗略地说，就是自从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以来）中国的历史记载，我们发现历史一直坚持重复自身，复制其暴力造反，复制其伴随有大屠杀的“天命气数已尽”的王朝的垮台，复制其循环交替发生的动乱和休养生息。在一个向人们谄

在这部评传中，布兰德反复声称，李鸿章之所以能够走在同时代国人的前列，之所以有资格入围 19 世纪的打造者，是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了清末的中国缺乏实力，无法与列强直接抗争，而只能牺牲一些利益来换取和平的环境，以便从事现代化的建设，以增强经济和国防力量，而他的这种努力，使他在海外享有盛名，并部分地取得了成功。布兰德的这个观点是否站得住脚，是否能够为当代中国人所接纳，尚须接受读者诸君的检验。

另一方面，布兰德又一再强调，李鸿章之所以未能把中国引向富强之路，他那耗资巨大、苦心经营的海陆军之所以在 1894 年的中日战争中遭到惨败，完全是因为他任人唯亲、贪污腐化所致。这个看法，跟中国人 100 多年来对李鸿章的评价毫无二致。贪财是李鸿章及其僚属的致命伤，而官场腐败是导致中国贫穷落后、社会动乱的罪恶之源。布兰德认为李鸿章及整个封建官僚体制留下的这份邪恶遗产，后来又被中华民国的官僚集团所吸收，以至于流毒无穷，给人以革命未能彻底的印象，确实是颇有见地的。在 21 世纪的今天，官员腐败对中国社会的严重威胁犹在，乃是全国民众同声檄讨、深恶痛绝的罪恶渊薮，李鸿章给后人留下的历史教训，实在是值得重温，值得从布兰德的这部著作中寻找批判性的借鉴。

清末由湘、淮军出身的三位军政重臣，即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左宗棠与李鸿章都曾受到曾国藩的提携，而李鸿章更是曾国藩的“肘下之人”。但是，曾国藩和左宗棠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位大清官，而李鸿章却未能承继曾国藩清廉自守的衣钵，为他自己也为中国的历史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本书中引用的李鸿章的奏稿和书信，均依据清人吴汝纶编辑的

很快意识到洋夷所拥有的力量，是中国以其久经考验的兵法或治国之术也无望与之对抗的。李鸿章以清醒而敏捷的洞察力预见到这种局面必然导致的结果；他认识到，如果中国坚守古老传统的连贯延续，那么它将绝对无望于重建旧秩序，甚至无望于维护其主权与独立。此后，他的整个人生经历都记载了他的这种努力：试图让他的同胞接受这个真理。他加入 19 世纪打造者行列的主要资格，在于他的这些努力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在于他的进步观念和他对当代中国人的管理所具有的影响力。本书的宗旨就是揭示其影响力究竟何在，以及是怎样获得成功的。

李鸿章于 1867 年给皇帝呈上的一份奏疏清楚地表明，对于西方的冲击，对于改革中国行政与国防体系以适应这种冲击的必要性，他都把握了其关键的意义。这份重要的文件为解读李鸿章此后作为外交官与行政管理者的事业生涯提供了钥匙，我们在适当的时候会对它进行充分的讨论。在这里，我只需指出，它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其作者作为当时的湖广总督，大胆提出改革的主张，理由是外国在政治与军事上的优越性是不容置疑的。为了弄清楚向朝廷提交这样一份奏疏究竟需要多大的勇气，必须考察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及其同僚们——各省巡抚与中央各部权贵们的智力素养。泛而言之，那个时期的中国宫廷、检察机关、高官和儒士们，都超然地隔绝于外部世界，这正是过去两千年中中央王国统治者们的特性。

有些读者或许不熟悉中国的行政体系，为了给他们提供必要的信息，这里概略地介绍一下最后几位清朝的统治者，或许能使我们较为方便地研究这位大总督的事迹。理论上讲，从遥远的岁月直到 20 世纪初，中华帝国的政府是绝对的独裁政府，是原始形态的帝国

主义，其基础是祖先崇拜，是由于儒家体系的连贯延续性而已成为人们生活一部分的家长制。但在实际上，宝座上的皇帝（除了乾隆那样乾纲独断的君主）比宫廷华美大厦上的装饰性屋檐强不了多少。他的日常生活日程，每个细节有皇室法律的条文加以规定和限制，实际上让天子成了紫禁城围墙内的囚徒。作为天命的家族体系的中心，他担任的角色是在圣殿中主持庄严仪式的大祭司。的确，就他享有的个人动议权而言，他没有机会发挥官僚组织的无数功能中最小的职能。甚至在皇室开支和国帑这么至关重要的事情上，中国的绝对统治者首先得依赖于人们的好意与忠诚，首先靠着官僚阶层，走投无路时便求助于百姓。中国政府行使的这种专制权力，实际上归属于官僚群体；即便如此，历史表明，这种权力还总是被百姓自作主张的造反权所制约；还有一个基本事实也限制了这种权力，即中国行政体系下的整个当局是建立在道德之上的，而非建立于自然力量之上。

已故的 W. F. 梅耶斯先生（Mr. W. F. Mayers）曾于 1877 年在其有关中国政府的模范著作中指出：

中国的建立依赖于无处不在的官僚群体，这个群体是通过国民教育体系训练出来的，实践着基督教纪元破晓之前便已传播了数个世纪的行政格言，并受到私利动机的驱使，反对引进有异于古老教条的所有原则。

在这段准确的描述之后，他又适时地加了一段，为了提醒那些乐观的理想主义者，因为那些人即便在当时还在预言：中国人的国